

《六祖坛经》中的兼语式与现代汉语中的兼语式的比较

马梅玉

(南京大学 中文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六祖坛经》产生之后经过后人多次改编,众多版本中,敦煌本是最接近原作的一个本子。大概抄写于晚唐五代,在佛学史和语言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敦煌本《六祖坛经》为底本,对其中的兼语式进行研究,并与现代汉语中的兼语式进行比较,试图发现兼语式在该时期的发展状况,以加深我们对兼语式从古代到现代发展的脉络的认识。

【关键词】《坛经》; 兼语式; 现代汉语

《六祖坛经》以下简称《坛经》)是佛教禅宗的基本经典,产生之后经过后人多次改编。众多版本中,敦煌本是最接近原貌的一个本子,吕微《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将敦煌本定为五代的写本。笔者赞同吕微的说法,认为《坛经》是晚唐五代的抄本,反映的是晚唐五代的语法现象。

兼语式就是由兼语词组作谓语或独立成句的句式,其基本句法形式是:“N1+V1+N2+V2”(其中的N1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作为兼语式,其特殊之处就在于,N2既作V1的宾语,又是V2的主语,自身成为兼语,兼语式才得以存在。这种句式,先秦时代就有了,现在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晚唐五代是这种句式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笔者期望通过对《坛经》中的兼语式的研究能对兼语式在晚唐五代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使之与现代汉语中的兼语式进行比较,期望能加深对兼语式从晚唐五代到现代的发展脉络的认识。

本文对《坛经》中的兼语式作了穷尽式的考察,从V1和V2的语义角度出发,认为《坛经》中的兼语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坛经》中兼语式的语义类型

(一)致使类:

该类兼语式中的V1只表达一种抽象的意义,没有动作义,V1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让、使”,V2动作的发生是在V1的作用下产生的。该类型在《坛经》中出现了13例,此种类型的兼语式V1一般是单音节动词,多是“使”、“令”,如:

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

使六贼从六门出。

此类型的兼语式在现代汉语中还存在,还十分常见,“使”、“令”的致使义在现代汉语中还被广泛而稳定地使用着。如:

他的坚定使我疑惑起来,疑惑自己昨夜是否睡错了地方。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

在这种类型中,我们发现一个特殊的句子就是V1是一个双音节动词,而不是单音节动词:

令使患者悟解心开。

汉语的兼语式,其V1从古至今都基本上是单音节动词,在《坛经》中也是以单音节动词为主,双音节动词作V1的只见到一例,而在敦煌变文中,这样的复音节动词作V1的例子就相对多一点,有24例。《坛经》中这个双音节动词V1“令使”并没有凝固在后代语言中,而是被淘汰了,在敦煌变文中就有凝固在后代语言中的双音节动词V1,像“处分”一词。

在现代汉语中作兼语式V1的复音节动词较《坛经》和敦煌变文时代的复音节动词增多,如“禁止”、“强迫”、“鼓动”、“要求”、“使得”、“打发”、“促使”、“允许”,这大概与汉语发展过程中的复音化趋势有关。

以下几种类型的兼语式中的V1表示行为义,但动词V2的行为和V1的关系不像致使类那样紧密,V2虽受到V1的影响,但可以自主发生,和V1是间接关系。

(二)命令派遣类:

这种类型的兼语式中的V1有命令、派遣义,在《坛经》中共找到表示命令派遣义的兼语式共18例,此类型的兼语式中的V1用的是“差、唤、令、使、潜、引、领”等。如:

时有一行者,遂差慧能于碓坊踏堆八个多月。

五祖遂唤秀上座于堂前。

令迷人诵。

能使惠顺即却向北方化人。

遂潜达摩出境。

这些表命令、派遣义的动词在现代汉语中有的保留,有的



已经消失,如“差”在现在还用,如“那本书我立即差人去取”。不过这种用法多用于书面语;“唤”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单用,它已经和“呼”连在一起用于兼语式,但这种用法也只见于书面语中,如“呼唤全体中国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令”、“使”的命令派遣义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所以在现代汉语中就看不到这种用法了。

(三) 请求邀请义:

这种类型的兼语式中的 V1 表“要求、邀请”义,在《坛经》中共发现 7 例, V1 用“请、觅”,如:

请大师说不立如何。

须觅大善知识示道见性。

这种类型的兼语式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存在,并被广泛应用,如:

“请你替我把那东西拿出来,”他又说。(《现实一种》)

(四) 劝诫告教类:

此种类型的兼语式中的 V1 表示“劝诫、告教”义,在《坛经》中共发现 3 例, V1 用的是“劝”或“教”,如:

更劝他人迷,不自见迷,又谤经法。

吾今教汝识众生见佛,更留《见真佛解脱颂》。

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也有保留。如:

我劝家珍想开点,凤霞命苦,这辈子看来是要苦到底了。

(《活着》)

(五) 存在、判断类:

在《六祖坛经》中,“有”字、“是”字兼语式数量很少。据统计,“有”字兼语式仅 1 例,“是”字兼语式 4 例,如:

善知识,观有人教人坐,看心看净,不动不起,从此致功。

——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应得我法。

——罪过,实是神秀作。

不是慧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各于自身自性自度。

“有”字句是表存在的一类兼语式,动词 V1“有”表示存在意义,对 V2 不施加任何影响,动词 V1 只是在陈述 V2 这个动作的存在。

关于“是”字句是不是兼语式,有不同的看法,基本上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是+小句宾语”整个结构是做谓语的,“是”是表判断的动词,以吕叔湘先生为代表;其二,认为“是”是词缀,尤其是用在代词前面的“是”,认为这是晚唐五代这一历史时期,口语中出现的新兴的代词词缀。以刘坚先生为代表,贾小云先生也持这种观点;其三,认为“是”是判断动词,并认为这是兼语式,以太田辰夫和林国伟先生为代表,但他们未对此做出详细的阐释。

仔细分析三种观点,我们同意并支持第三种观点。吕叔湘先生的看法固然有他的可取之处,但是在兼语式这个问题上,吕先生的看法似乎有点前后不一,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吕先生讲到,兼语式中第一个动词的选用有一定的限制,一般是表示命令或祈使类的及物动词,而且后一个动词往往是前一个动词的结果或目的。按照吕先生对于兼语式的说法,首先,“有”字不是表示命令或祈使类的动词;其次,“有”字句中的后一个动词也不是前一个动词的结果和目的。如“有人来了”。动词

“来”并不是动词“有”的结果或目的,“有”只是陈述动词“来”的,并不对它有任何的影响。而在该书中吕先生却把“有”字句看作是兼语式。我认为,“是”字句实质上是和“有”字句相似的句子,既然能把“有”字句看作兼语式,为什么“是”字句不能是兼语式呢?

贾先生主要对“是+代词+动词”这类句式不是兼语式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他用来论证的第一个理由是:一般的兼语式,第一个动词前面的主语或形式上存在,或意念中有且一般可以补出。但该理由并不能作为判断兼语式标准,兼语式之所以被称为兼语式最根本的标志是因为有兼语词组的存在,故“是+代词+动词”仍可看作兼语式。更让我们费解的是,贾先生认为,如果“是+代词+动词”出现在问句或答句中是兼语式,既然句式是一样的,出现在问句或答句中与在一般的句子中有何不同呢?他用来论证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吕先生的观点,上面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赘述。贾先生用来论证的第三个理由是:兼语句中的第一个动词不能省略,而“是+代词”结构中的“是”可以省略,并且不影响句义和表达。我们认为,这种结构中的“是”可以去掉,其余部分也可以独立成句,但去掉之后却影响句子表达效果,它使句子失去了原来表示强调的意味。如上面的例子“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应得我法”。这本来要强调的是“汝作”;如果去掉“是”,则这种强调的意味消失,并且该句子所表达的“作”是已发生动作的意味也消失。

我们认为上面所举的“是”字句应该是兼语式,理由有如下几点:

首先,在语义停顿上,我们读或说的时候肯定在“是”后面的名词或代词后面停顿,而不是在“是”后面停顿。如果说是“是+小句宾语”的话,应该在“是”后面停顿。这是许多学者已经论述过的问题了,不再赘述。

其次,“是”可以与后面的名词或代词构成动宾词组,同时此处的名词或代词又可以与其后面的动词构成主谓词组,也就是说“是+名词/代词+动词”是一个兼语词组,并且这个兼语词组是作谓语的,这已经满足了兼语式的基本条件。

所以我认为“是+名词/代词+动词”是兼语式,“是”是表判断的动词。

这类兼语式在现代汉语中仍很常见,如: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里面空无一人但却有个死人躺着。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

这下我才放心,肯定自己刚才是眼花了。(《死亡叙述》)

二、其他问题的讨论

问题一:

在《坛经》中有这样一些句子,如:

告诸同道者,令知密意。

勿令破彼疑。

令随众作务。

其实这种省略“兼语”(姑且称之为兼语)的类型从上古到现代都有这种情况。例如:

无使滋蔓,蔓难图也。(《左传·隐公元年》)

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左传·隐公十一年》)

现代汉语中也有许多这样的说法。如:

同时注意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帮助创造和改革少数民族的文字,帮助建立医疗卫生机构和电影放映队,并且加强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发行工作。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把这种类型的句子看作是兼语式,认为是省略了兼语的兼语式。周秉均先生在《古汉语纲要》中也认为是兼语式,认为是省略了兼语“之”的兼语式。

我们认为不能称之为兼语式,其一,兼语式之所以被称为兼语式是因为有兼语词组的存在,没了兼语词组也就不能称之为兼语式了。其二,在兼语词组中,兼语既是V1的宾语,又是V2的主语。而在古代汉语中,代词“之”是不能作主语的,所以这里即使是省略了兼语的话也不可能是省略了代词“之”。其三,游汝杰先生在《现代汉语兼语式的句法和语义特征》一文中运用题元理论和论元结构对兼语式进行了研究,得出:“兼语式中的V2的必有论元只有一个。”既然是必有论元就不可以省略。这只是在语义上存在一个空语类,而这个空语类具有兼格的作用。

我们赞同李佐丰先生的看法,在句法层面上,这些句子是V或VP充当宾语的动宾谓语句。

问题二:

在兼语式中有这样特殊的类型,如:

引慧能至南廊下。

遂唤卢供奉来南廊下,画《楞伽变》。

这样的句型,有人称为“连动兼语式”,这种说法欠妥当,说

是连动式对N1来说是可以的,妥当的;但是对于N2来说却只是兼语式,因为N1施行了V1和V2的动作,但N2只是施行了V2的动作,所以说把这种句式称为“连动兼语式”不太妥当,容易引起误解。

问题三:

在《坛经》中我们还找到这样一种特殊的句子:

他非我有罪,我非自有罪,但自去非心,打破烦恼碎。

高增良先生在《六祖坛经中所见的语法成分》中说,这是一种类似兼语式的格式,我们认为这就是兼语式,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个句子中的V1不是一个光杆动词,V1的后面有个形容词“破”做V1的补语。这种类型的兼语式在现代汉语中很少见,我们不能因此而把它排除在兼语式之外。

三、总结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兼语式这一特殊句式在晚唐五代的发展状况。现代汉语兼语式是从上古发展而来,通过对《坛经》中的兼语式和现代汉语中的兼语式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坛经》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汉语兼语式的雏形,在兼语式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高增良.六祖坛经中所见的语法成分.[J].语文研究,1990.(4)
- [2]慧能.邓文宽校注.六祖坛经——敦煌《坛经》读本[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 [3]李佐丰.上古汉语研究[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
- [4]林国伟.敦煌变文中“是”字用法述略[J].古汉语研究,1992(2).
- [5]吕微.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中华书局,1979.
- [6]史震己.关于左传的兼语省略[J].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4).

(上接第137页)

释为“择”。《礼记》、《仪礼》中的这些“苾”往往与“羹”或“铏”相提并用为“苾羹”、“铏苾”之类。按郑玄的注解是:苾,菜也。孔颖达疏曰:“‘苾,菜’者,按《公食大夫礼》三牲皆有苾者,‘牛薺、羊苦、豕薇’也。是苾乃为菜也。用菜杂肉为羹。”(《礼记正义》卷二十七内则第十二)^{[3][P516]}可知“苾羹”就是肉汤加蔬菜的菜羹。不同的肉汤需加不同的蔬菜,所谓“牛薺、羊苦、豕薇”,便是分别于牛、羊、豕肉汤中加薺、苦、薇等蔬菜。这种苾菜的做法及“苾菜”这一词语的用法,直到今天还有,吴小如先生在其《说诗·关雎》一文中曾谈到:“在现代汉语中,特别是北京方言,我们经常还听到用沸滚水把菜蔬‘苾一下’的说法。即等水烧开后把生的菜放进去,‘苾’之使熟,随即捞出。”^[4]怪不得姚际恒《诗经通论》说:“苾为熟义,非择义”;而比他更早的朱熹,在其《诗集传》中则释“苾”为“熟而荐之也”。联系到“苾”字的本义,将蔬菜加入肉汤,菜浮于汤上,总算有了“草覆蔓”的感觉。从“草覆蔓”即已引申出“苾羹”的意思,再由“苾羹”引申出“择取”的意思就不难了,朱熹说:“彼参差之苾菜既得之,则当

采择而亨苾之矣。”当然,回归到整个《关雎》的象喻系统中来,“苾”字由“草覆蔓”一步步引申而来的“择取苾菜”义,还只是表层的意思,其深层次则包含有求淑女(或求贤或实现理想)即将成功(甚或已经成功)的意思。

总而言之,《关雎》是一个多层复杂的象喻系统,具体到其中的关键词“流”、“采”、“苾”,也有着多层而递进的丰富意蕴,这些意蕴既是《关雎》创作时所本有的,也是自《关雎》所产生的时代、编辑入《诗》的时代起就已开始被解读者们所附加进去的。每一个解读者都可以带着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它们不同的意蕴,但就整个《关雎》诗的存在史而言,它是一个多层复杂的整体。

【参考文献】

- [1]朱一清.《诗经·关雎》“流”字新解[J].文学评论,1980(4).
- [2]黄卫星.《诗经·关雎》比喻结构研究[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2).
- [3]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4]吴小如.说《诗·关雎》[J].文史知识,1985(8).